

释阮籍《咏怀》诗中的“真”字

于 宸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358

摘 要: 阮籍早年服膺儒家,后援儒入道,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儒道融合,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思想,在《咏怀》组诗中有所展现。组诗中大量出现带有“真”的诗句,表现为其求“真”的道家性。“真”之特性是社会因素与哲学因素共同作用生成的。“真”的道家性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哲学思想在阮籍《咏怀》诗中的体现。阮籍咏怀诗在展现阮籍内心痛苦灵魂的同时,也展现了正始时期士人在两种因素影响下的内心矛盾与生存哲学。

关键词: 《咏怀》诗;真;玄学

引言

儒学自汉末以来,渐与玄学合流,是为儒学玄学化。阮籍为玄学名士,其儒道融合,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思想,学界多有讨论。《咏怀》八十二首,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然阮籍儒道思想对《咏怀》诗思想情感之建构,两者于《咏怀》诗中之关系,学界未有讨论。阮籍诗歌中大量用到“真”字。“真”为何“真”,“真”与阮籍《咏怀》诗思想建构又有何关系,我们后面将继续探究。

一、“真”道家性之思想基础:儒道自然观的趋同

阮籍“真”的道家性,经历了以自然求真的思想运动过程。本章上述四首咏怀诗中,“自然”成为阮籍抒发情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

“园绮遯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寃耀焉足崇。”

“游衍伊洛滨……辩慧怀清真。”

“道真信可娱……从此适河滨。”

无论是直抒胸臆或是引事用典,作者求真的思想都是在自然环境下建构的。这种自然为先的建构理念又来源于阮籍道家与儒家思想的合力运动。

儒家虽偏于形而下的实践运动,但儒家在寻找最高的理论依据时,不得不与道家所陈述之自然趋同。形而上的本体论层面,《礼记》中有“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点出天道无为的本质。《性自命出》中又有“道者,群物之道”,指出道源于自然且遍布于天地之间。在形而下的具体实践层面,儒家同样强调自然的作用。孟子有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强调顺自然规律而行人事的同时,也指出顺应自然对社会政治的作用,显示出社会政治对自然的复归,最终借由自然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这也与道家的社会理想相同。

因此,两者在本体论上的趋同为阮籍建构哲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阮籍早年著作《乐论》中就有以自然述名教的思想:“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礼乐是圣人体自然而作,是自然规律的显现。循圣人之礼乐,人人才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自然通过规律来谋划发展前景,使得人际关系能各得其所。因此玄学的内圣外王思想渗透着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这也是阮籍《乐论》中社会政治意识的来源,阮籍试图统一自然与名教的努力,为他在竹林时期从自然求真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理论建构:去名教而向老庄

竹林时期,儒学已成为司马氏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和排除异己的手段。陈郡何曾,外宽内忌,性好奢豪,仍以礼法之士自居。见阮籍猖狂风流而欲杀之。《世说新语·任诞》中有:“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食酒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瞰不辍,神色自若。”儒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完成推动社会由乱到治的历史任务,早期玄学对名教礼法的再建构也未能重现社会的和谐。士人的思想探索中心从社会秩序重建转移到实现自身的超越中,这种对自身的超越,在阮籍的诗中体现为“真”。

阮籍《咏怀》诗中多有论真：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

“园绮避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

“游衍伊洛滨……辩慧怀清真。”

“道真信可娱……从此适河滨。”

阮籍之真，或是抒发苦楚之情后，言求真之志；或是感叹世事无常，隐世以求真；亦或是感叹仙人之资，形轻气轻之真，就儒道思想看，阮籍“真”的一致性，表现为阮籍《咏怀》诗中的“真”是道家之“真”而非儒家之“真”。

在儒家层面，首先，儒家不直言“真”。北宋刘安世、南宋洪适、孙奕，皆有六经之中无“真”字之说。杨少涵认为，“〈老子〉中的‘真’有两种用法，一是对宇宙实体的表达，二是对人生德性的表述。而老子‘真’字的两种用法与〈中庸〉‘诚’字两个方面的意义几乎完全对应。”以诚为例，《易经》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无意志的天道客观的具有德行，“诚”则是天道德行中的一种。再次，“诚”体现了儒家反形式主义的特点。“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也。”《乐记》又有“著称去伪，礼之经也”。“诚”作为“质”，有着规范形式的作用，体现了早期儒家重视本质的同时，对儒学可能流于形式化的“伪”的反思。因此，儒家之“真”虽不直言，却体现出强调本质而不流于形式的特点，是先秦儒家哲学体用结合的表现。

但儒家的自我反思并没有避免儒学走向流于形式的道路。自汉大一统以来，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儒生与儒术政治化程度加深，帝王通过政治运作，将儒家学说变为手中的工具，充当最高经师的角色。学术上谶纬之学的兴起与家师家法的恪守使得儒学进一步僵化且流于形式，成为皇权控制士人的工具。正始之世，司马氏的崇儒奉孝迫使以阮籍为代表的一批士人从儒学之外寻求重建精神世界的可能。在儒学玄学化的同时，阮籍之真走向了道家之真。

三、思想表现：真情至性、无君无臣、万物同一

“真”就字源意义上讲，与成仙有关。杨少涵认为《说文解字》中的真“本义是‘长生不老、升天而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入深山，养生修仙。”仙人处于远离尘世的自然环境中，且有长生的特点，真则有远离尘世，追求长生的仙人升天而去的意义。真字不仅与阮籍《咏怀》诗中返自然、修仙术、求长生的内容相呼应。也从字源意义上建构了一条从自然到真的路径。

老庄哲学中的自然，是蕴藏在自然万物中的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庄子·马蹄》中有：“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又有：“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以自然事物“马”作为论证对象，将马自然而然的的状态称为“真性”。“真性”不受人干涉，未经伪饰，是“天”自然而然的特性在万物中呈现出的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之为“真”。阮籍的诗歌创作在感性上发扬老庄哲学之“真”，即使阮籍《咏怀》意旨遥深，我们仍能从诗歌中直观受阮籍的真实情感：

临觞多哀楚……凄怆怀酸辛……愁苦在一时。

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

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

综上，从感性角度，真为阮籍提供了自然这一可以直接把握的客体对象与意欲实现的生存状态，也为阮籍诗歌真实情感的抒发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而在理性上，阮籍同样在诗中对政治哲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

两首诗歌同时建构了一个由秩序到混乱的环境。已成功业的“良辅”、“英雄”，在“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下，于高位跌落失去财富与权力；未能建立功业的有志之士，如第二首诗“宁子岂不类”中的宁戚，无贤君明鉴也不得任用。人们在礼仪崩坏末世行走于污垢尘埃之中，栖栖徨徨。面对末世，阮籍从老庄哲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混乱的原因进行了探索。

老庄哲学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处在一个逐次下降的过程中，圣人、仁义成为社会价值体系崩塌与社会环境混乱的产物：“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此为基础，道家希望复归于社会的蒙昧状态，整个社会体现为原始的和谐，仁义、智慧、孝慈等社会观念也无存在的必要：“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老庄哲学的社会政治实践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具有空想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相违背。阮籍批判继承了老庄哲学

的这种主张,提出了相对温和的见解:“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阮籍对上层的统治者与国家机器提出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封建主义的弊端。统治者不受限制的私欲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国家机器成为服务于君王个人欲望的工具而非纠正君主行为的保险措施。阮籍并无能力改变现状,其政治实践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在对外的社会实践失败后,阮籍不得不转向对个人精神境界的探寻。

上文提到,阮籍在道家之志中否定了肉体成仙的可能性,而在《大人先生传》中描绘了思想的理想境界:“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的境界与老庄哲学的“真人”境界有着共通性。老子曰:“所谓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俱生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纯粹素道。”阮籍的“大人先生”形象和老庄哲学中的真人与道相通,道法自然下,人这一存在于自然中的个体也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相通。阮籍将人作为主体实现与宇宙客体的合一,从而变化随心,静动随意,实现绝对的逍遥与自由。这既是阮籍《大人先生传》中大人先生的人格特点,也是阮籍《咏怀》诗中求“真”而期望达到的理想的精神境界。

综上,先秦儒家自然层面与道家的共通理解以及阮籍青年时期的习儒经历,为阮籍后期于自然中体真提供了哲学基础;竹林时期的政治环境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建构理想的精神境界提供了方向指导;而老庄哲学万物同一的思想则为阮籍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在“真”中建立起理想的精神世界和人格。

四、生成原因:理想境界的求索

阮籍早期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他认为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是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之间彼此感应自愿组合而成的。这种组合的规律源于自然,组合的过程是自然的体现。但司马氏以名教治国,实则借名教排除异己的行为,让阮籍感受到了现实名教的异化,现实名教与理想名教的对立,使得阮籍不得不寻找名教之上的自然来实现内心的平衡。但阮籍的“求真”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用结合的审视下体现出极大的缺陷。阮籍意欲以“愿耕东皋阳”的隐居来保守自身之“真”,又想达到“大人先生”式的“清洁存精神”的精神状态,实现主体与客体宇宙的统一。但这种精神状态建立在相对主义视角下,指向超现实的彼岸世界,将现实名教与

自然对立起来,违反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用结合的思想。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借大人先生言理想的自然状态:“是以不避物而处,所睹则宁;不以物为累,所由则成。”这一点和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自然非与名教对立才可实现,名教中亦有自然;逍遥非绝于尘世才可实现,尘世中亦能逍遥。阮籍在哲学中构建的名教自然和谐状态,在他的《咏怀》诗中被否定,阮籍对自己所建构的哲学世界仍存在着情感上的抵触。

结语

综上,阮籍“真”的道家性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哲学思想在阮籍《咏怀》诗中的体现。我们亦可从这种特性及其生成原因中探知阮籍《咏怀》组诗的情感建构与哲学因素。在这种特性背后,我们仍能感受到其政治的两难处境与哲学思想的缺陷,这种缺陷来源于阮籍诗歌情感与哲学上的矛盾,也展现了阮籍动荡不安的灵魂。

参考文献

- [1] 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4]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 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6] 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7]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8]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9] 严可均编:《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10]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 [11]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0页.
- [12] 杨少涵.十三经无“真”字——儒道分野的一个字源学证据[J].哲学动态,2021,(08).